

台湾文坛的怪侠，随心所欲的黑马

李敖：我将归来



开放

新疆美

术摄影出版社

琼瑶：《窗外》为何不写男女主人公性交？

三毛：人不漂亮想当爱情明星对劲么？

岳飞：“岳家军”也曾掠夺民女。

他归纳出：不讨老婆有 33 个“不亦快哉”

他评中国人的贪污、赌博、及床上功夫……

2010年雙譜(三)

新一屆評委會

評委會秘書處

我將归来开放

●李敖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新登字 070 号

责任编辑:杨 昕

封面设计:刘梁伟

版式设计:李 健 雨 山

我将归来开放

李敖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K 9.0625 印张 208 千字

1994年 7月第一版 1994年 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80547-199-1/I·3 定价:6.80

目 录

我将归来开放(代前言).....	(1)
中国人的贪污思想.....	(3)
床上功夫.....	(5)
中华大赌特赌史.....	(11)
花钱的本领.....	(20)
发财的真价值.....	(22)
长袍心理学.....	(24)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30)
李敖不可怕.....	(36)
“上下”与雅俗.....	(38)
社会转型未到家.....	(40)
“一字师”和改文章.....	(42)
如果爸爸犯了罪.....	(44)
可怕的哥哥.....	(46)
用笑脸做后盾.....	(48)
“赤子之心”.....	(50)
没良心.....	(52)
闯“红灯”.....	(54)
笔上无毛说.....	(56)
岳飞案的另一面.....	(58)
美人的死与英雄的死.....	(61)

奇情与俗情	(66)
圣人教育	(71)
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	(73)
万世生表	(78)
半部论语治天下	(80)
王八一落千丈考	(83)
女人的理由和男人的理由	(92)
论正视	(97)
灵肉可以分家吗	(99)
避祸学大纲	(104)
“特殊坐”和“普通坐”	(108)
牛肉面老板的七封信	(112)
刻薄的批评与正真的建议	(121)
看谁文章写得好	(123)
大慈大悲李敖菩萨	(128)
论和尚吃肉	(133)
从《传统下的独白》到《独白下的传统》	(138)
开玩笑的自由	(142)
漫画的自由意义	(147)
《千秋评论》一百期期期期期	(149)
台湾十种骗子	(152)
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155)
寻乐哲学	(167)
无为先生	(176)
内有恶犬，但不咬人	(179)
什么叫“理来情无存”	(180)

绝子如不见	(182)
跑出来的理由	(185)
中国式好人	(187)
三毛式的伪善	(191)
给杨贵妃的一封信	(193)
没有窗，哪有“窗外”	
——琼瑶要把女孩儿们导向那里	(195)
不讨老婆之“不亦快哉”	(232)
不交女朋友“不亦快哉”	(234)
坐牢的三十三则不亦快哉	(236)
拉杂又有“不亦快哉”	(239)
潭畔寻思录	(242)
“国际奸人”的新花样	(245)
古今哭庙大观	(248)
哭的政治与政治的哭	(251)
近闻零感	(254)
树敌之乐	(257)
从“离婚专家”到“离婚大王”	(260)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263)
古老的中国！你该选择	(270)
幸亏有我	(274)
关于李敖	(279)
我们相信(代编后)	(281)

我将归来开放

(代前言)

李敖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
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这样。

可是这一回你错了，
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
弱的总会变得壮；
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
却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像一朵入夜的荷花；
像一只归巢的宿鸟；
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
我消失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击穿；
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

当百花凋谢的日子，
我将归来开放！

(一九五七·七·廿九)

中国人的贪污思想

贪污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但是中国人的贪污思想，除了恶与人同之外，又有它的独立特色，应该特别研究。

中国人的贪污分三大类：一是贪得无厌型，一类是政治作用型，一类是应付开支型。

贪得无厌型是指贪污所得，根本不是用来花费，只是满足个人的贪心。明朝严嵩贪污，家产可支付好几年的国防预算；清朝和坤贪污，家产可支付二十年全国预算。这样庞大的贪污所得，当事人虽寿同彭祖，活八百岁，也花不完，所以这种贪污，只是病态的“贪污狂”而已。

政治作用型是指贪污避祸，根本不是要贪污，只是消弭人主的猜忌。汉朝萧何“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贱疆买民田宅数千万”，目的无他，意在告诉汉高帝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宋朝石守信被“杯酒释兵权”后，“专务聚敛，集财巨万”、“募民辇瓦木，驱迫甚急，而佣值不给”，目的也无他，意在告诉宋太祖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这样有意的贪污自污，当事人实非爱钱，但是格于人生，不得不爱它一下。此类政治作用的贪污，有的甚至是奉命的。南唐以五万两银子贿赂宋朝赵普，人主却说“此不可不受”，最后南唐派本家老弟来朝，人主除赏赐以外，秘密送来红包，打开一看，数目正与五万两银子相等！可见奉命贪污，可做为人主明察秋毫的政治作用，贪污之为

用。亦大矣哉！

应付开支型的是指贪污原因，根本在入不敷出。有趣的是，这种入不敷出，并不以小官穷吏为然，封疆大吏也一样，在后魏时代，根本没有官禄之制，清官贫苦异常。如高允住在草屋、吃盐菜，儿子要采樵自给，才能活命。到了明清，也好不到那儿去。明朝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活母亲妻小。到了清朝，总督年俸不过一百八十两、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五十五两，都不能活。雍正创制“养廉银”救命，但是行之既久，物价上升，其廉也未易养，再加上财政拮据，“养廉银”也停支或削减，发挥不了作用。政府方面，一方面养廉，一方面贪污，最明显的是卖官鬻爵，做官要捐，才有官做。并且越捐越不值钱。一个知县（县太爷），在乾隆时要捐四千六百两才能做，到了光绪时，只消二千六百两就成了。照许世英的回忆，一名小京官的官俸是纹银七十两，但可分到“印结费”三、两。“印结费”就是捐官晋京朝见时的“孝敬”。晋京朝见，必须同乡京官用印具结做保，被保的人，一律要出钱，汇集起来，由同乡京官公分。因为京中开支大，必须贪外官之污，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外官不贪污，也不能活。于是贿赂公行，满朝皆贪污。可见这种公然的贪污，是制度使然。制度使中国人不以贪污为耻、制度腐化了世道人心。

国民党调查局在二月一日成立了肃贪处，准备大举惩治贪污，我看了很好笑。中国人惩贪，从明太祖剥皮到国民党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的死刑条款，何代不严？但贪污之事，何代无之？根本的原因很多，在政府方面，制度上必须修正两点，方有起色。第一是监督工作，不能出自政府本身；第二是薪金给付，必须合乎情理。例如公教人员房租津贴每月七百元，这

种数目，连间厕所都租不到，如何养廉？这样开玩笑，人不贪污，其可得乎？

卷之三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日

取而古作“昭”字，又云“行而同人，悦之也”。毛氏云：“元和志：许州汝阳县有昭陵，即唐太宗之陵也。”说一脉，始大德才也。魏王曰：“昭陵，今在河南府，其南有昭陵寺，寺南有昭陵碑，碑文有昭陵二字，不以文简，故名昭陵乎？其一，和宣皇帝之葬也。葬于昭陵，故名昭陵。昭陵碑文有昭陵二字，是其所以名也。魏王曰：‘昭陵，今在河南府，其南有昭陵寺，寺南有昭陵碑，碑文有昭陵二字，不以文简，故名昭陵乎？其一，和宣皇帝之葬也。葬于昭陵，故名昭陵。’”

床上功夫

这月十一、十二号，人间副刊上登出高可攀的“千古艰难唯一床”。可攀周游列国多年，见多识广，又精通南腔北调胡文多种，由他出洋相，写古今床事，忽上忽下，深入浅出，看来津津有味。其中有两段插播，原文如下：

“高可攀写床写得兴起，索性连独家的研究心得也透露了几分，给各位长长见识，免得大家都像文化顽童李敖一样，哇啦哇啦猛叫我中华尚有人耶？李敖听着，没有床，焉有人，此理甚浅，此事至明，不研究床而研究人，呜呜呼呼，李敖殆矣！”

这是可攀的苦口，他又说：

“可怜我高可攀少小去国，国史的根基太差，实在不知道咱们中国的老祖宗从树上下来以后，到底拿什么东西当床用，想画个祖宗床来佩服佩服，竟也画不出来，以致常被夷狄之辈恶徒消遣，说我数典忘床。”

这是可攀的苦心。

为了使我这位台中一中的小学弟，不再苦口相劝，苦心难显，我决定表演一下我的床上功夫，和可攀异床同梦，敬请可攀和大中华爱床的人指教。

话说我大中华老祖宗，从树上下来以后，到底拿什么东西当床用，这个答案，可真不简单。要了解这个真相，首先得放弃我们现在对床的定义。不放弃这种定义，我们无法了解老祖宗，和他的床。

老祖宗给床下定义，说：“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下一句一看就很邪门，有问题，“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这种定义，与其说是指床，倒不如说是指棺材。好，不再说不祥之言，就通过这种定义吧。问题又出在上一句——“人所坐卧曰床”，照我们现在的定义，床是“卧”的，不是“坐卧”的。如果“坐”，另有板凳、椅子、沙发好坐，为什么要坐床上呢？

就这样的，问题的开始，就是学问的开始。有学问的答案是：——古人没有板凳、椅子、沙发，古人坐在地上，坐了好久好久，才学会坐床；一坐上床，床就坐卧两用，所以才叫“人所坐卧曰床”。

古人坐在地上，屁股底下有块长方形的草垫子，叫做“席”，席是老祖宗表达尊卑、区分人我、划清势力范围的一个妙单位。这个单位，可以在必要时候一分为二，叫“割席”。任安与田仁在平阳公主家，被安排“与骑奴同席而食”，两人大不高兴，就把席一割，表示不同席；管宁与华歆在一起念书，门外有车马之声，华歆起来去看热闹，回来就被管宁割席，说你格调这么低，“子非吾友也！”这两个故事，都含义很深，都说明了“同席”是有规矩的。

不但同席有规矩，同席的细节也多得很，东边主位的是“首席”，西边敬陪末座的是“席末”，我们现在常用的“出席”“入席”“筵席”“酒席”“离席”“逃席”“缺席”“主席”等等，都是从这儿变出来的。因为席有这么多名堂，所以有“避席而请”、“越席而对”、“侧席而坐”、“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席不正不坐”等种种典故。一般情形，一席可容四人以上，长者大模大样坐在顶头，但是若来了第五个，就妙了，第五个一来，长者就在本席给请走，在旁边另开一席，独称老大，这在经典中，

叫“君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规矩跟现代中国人正相反；现代中国人是叫小辈在旁边、在席外，从固有文化标准看，这是对长者的大不敬。

老祖宗在席上活动，一切都是平面的，就像日本人住的榻榻米房子，大家多的是膝行跪姿。我们读《史记》项羽本纪，看到鸿门宴时“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刘邦）北向坐”，若以为他们是“坐”，就大错特错，他们其实都是“跪”，那时候没有桌椅，一切都是落地干的。自天子以至庶人，全体一致。李商隐写天子见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虚前席”就是两人在席上对跪，中间保持一段距离，表示是皇上尊敬知识分子。

在席上跪来跪去，终于有人感到太不舒服，决定不跪了，干脆一屁股坐在席上，两条大腿，朝前一伸，自在起来了。这种自在的姿式，叫“箕踞”。箕踞视为无礼，因为老祖宗当时不穿裤子，这种姿式，有自我暴露之嫌。《韩诗外传》记孟夫子回家，看到孟太太一个人这种姿式，就吵着要离婚，其理在此。

在席上两条大腿朝前伸，既然诸多不便，于是聪明人想起：何不坐在床上箕踞呢？第一号聪明人，就是鸿门宴逃席的刘邦。刘邦接见郦食其，箕踞床上，两腿下垂，叫女人给他洗脚，郦食其责备他怎么可以“踞见长者”？刘邦认错。这段记载，透露了千古大秘密——中国古人开始有现代的坐姿，坐在床上，面有歉意的坐在床上。

真是面有歉意，古人在席上大跪特跪久了，床对于他，本来只是“卧”的，不是“坐卧”的，如今可坐可卧，实在过意不去，不但愧对此床，也愧对斯席。于是，有一批保守主义者，即使上了床，也继续大跪特跪，有的人床上“当膝处皆穿”，有的人“床

有膝痕”，这些人在中国下跪史上，的確是大丈夫。

《论衡》里记孔夫子将死，留下一段话说：“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亡。”孔夫子真伟大，他预言到统治者要在床上占老百姓便宜，事实演变，果然不出所料。统治者终于觉得：“虚前席”式的平起平坐，实在不够神气。于是，慢慢的，统治者在殿堂之上，抬出床来，自己坐在床上，向席地而坐的发号施令起来了。“人所坐卧曰床”，自此一物两用，变成了统治的道具。《世说新语》里记匈奴大使来朝，曹操“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叫人替他坐床上，他自己化装成卫士，“自捉刀立床头”。匈奴大使出来，曹操派间谍问对魏王曹操印象，大使说：“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大英雄也！”这是统治者和床的一个最有趣故事。

统治者刚坐上床的时候，倒也不乏“同床共坐”的故事。晋朝皇帝登基，百官陪列，他叫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说“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坚持不敢；唐朝皇帝践位，“多引贵臣共榻”，刘文静就不赞成，认为“帝座严尊”，不可“屈与臣下均席”。统治者与床的大结合，到了宋朝皇帝，一言道破：宋太祖伐南唐，南唐李后主派徐铉送礼物过来，请求退师。徐铉的理由是：“我们南唐无罪，我们以小事大，像儿子伺候老子，为什么还要打我们？”宋太祖说：“江南小国，哪个又有罪来着？但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宋太祖真是行家，他对书呆子说话，不拈花微笑，却直抵花心，真干脆！

唯一遗憾的是，床的体积太大了，总是难免惹人同坐或鼾睡，殊嫌美中不足；何况庙堂之上，摆个大床，实在也不好看。这时候，西方文化帮了大忙，一种叫做“胡床”的东西，传到了中国，时间在二世纪尾、三世纪初。胡床并不是床而是一种像

胡金铨他们专用的导演椅，只能老子一个人坐，这就是椅子的前身。中国人接受了椅子的西方文化，到了北宋末年，全国大流行；统治者有御椅，大富翁有檀香椅，大强盗有第一把交椅，于是，全国男女老少，都从此坐人坐样，卧有卧样，不再坐在床上，更不席地而坐了。床和椅子，从此也变成两件家俱，不一物两用了。

胡床刚到中国的时候，老祖宗正坐床上，看到能容纳屁股的，都叫做床，所以把胡椅叫做胡床。后来弄明白了不是床，又忌讳有“胡”的字样，于是又不胡又不床，变成了椅子。但不论怎么变，中国人在椅子上，上了洋鬼子一个大当：老夫子把钢笔推开，用毛笔大谈西方文化要不得，不知道西方文化，正藏在屁股底下，他整个屁股正在全盘西化。——西方文化“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可真把人忙得“席不暇暖”了！

一九七九、七、十七。用毛笔写完

中华大赌特赌史

一、“有目”供赌

十六、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家李雷，曾做诗描写爱神邱比特跟他的情人赌牌，女方以吻做赌本，邱比特以弓箭箭鞘做赌本。不料邱比特霉运当头，不但输掉弓箭箭鞘，甚至连他妈的鸽子麻雀等等，都一齐输光。最后他赌得兴起，竟以两只眼睛下注，结果仍是一输到底。从此爱神变为盲神(BILNDGOD)。“爱情是盲目的，来源也就在此。

依这神话看来，好赌之性，不始于人，而始于天，连神仙也不例外。难怪乎大老爷们一禁赌就要惹得“人神共愤”，闹得鸡犬不宁了！

谈起赌来，可真是个大题目。我现在大题小做，想单就“固有文化”方面谈谈赌的来龙去脉。换句话说，这篇文章以谈“国赌”为主，至于“洋赌”，我因稿费不足，赌气不谈。

“赌”这个字，它的原始意义叫“钱戏”，见于《一切经音义》。“赌博”两字连用，见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文字，赌就是“博”。“博”是最早的一种赌具，靠打射投掷定输赢，这种赌博，至少远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到了南北朝时候，才不流行。中国古书中有很多记“博”的材料，如《家语》中“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管子》中“……发五政，一曰‘禁博塞’”；《史